

“冯先生,这么早就来打扰您!”

“莫言老师,我们又见面了。上次你和余华一起来院里,还是在20年前……”

近日,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著名作家莫言和书法家王振现身天津大学冯骥才博物馆,他们此行专为探访老友冯骥才,并参观了新落成不久的冯骥才博物馆。面对丰富而珍贵的藏品,莫言举起手机全程“拍拍拍”;面对天大热情的学子,他由衷表示,这座博物馆是天大师生的福气。两位文学巨匠的温暖互动更成为津城开年的“文化高光时刻”。

冯骥才:我是莫言的“粉丝” 莫言:冯老师真性情,热心肠

相识40载 两位文学巨匠天大再叙旧

再相见 莫言再念打油诗

1月8日9时50分,感冒初愈的冯骥才已经等候在天大冯骥才艺术研究院(以下简称“冯研院”)门前,准备迎接自己的老朋友——著名作家莫言。10时整,身穿绿色外套的莫言准时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。莫言紧走两步迎向冯骥才,两位文学巨匠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他们边聊边走进冯骥才博物馆的序厅,老友相见,84岁的大冯先生和70岁的莫言都步履轻快,神采飞扬。

据了解,冯骥才博物馆刚一落成,莫言就给冯骥才发短消息,表示要尽快来看看。此次成行,莫言也成为这座博物馆落成后迎接的首位重量级文化名人。

“你上次到这还是20年前。”冯骥才对莫言说。据了解,2005年5月20日,在天津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之年,作家莫言、余华、语文专家郝铭鉴曾做客“北洋大讲堂”。当时,莫言畅谈了他在写作方面的感悟与思考,一晃20年过去,再次走进天大的莫言,已经见到了一座新的、满是宝藏的博物馆。

“今天我要拍很多照片,记者我也拍一下。”冯研院的会客室里,莫言掏出手机连接快门,进入“参观拍照”的节奏。看着墙上悬挂的他在2015年为冯骥才题写的打油诗,莫言笑着念了出来:“大冯如巨树,每见必仰望。做人真性情,交友热心肠……我这个算是顺口溜,主要还是说我们冯老师,做人、交友、做艺术都是真性情、热心肠。”

“地表最强”文人这样互动

“这‘四驱马车’有说法”“韩美林很少画这么大的马”“签名字,我想签在王蒙的旁边。”……作为博物馆的馆长,冯骥才变身“讲解员”,带领莫言、王振一行重点参观了北区的3个展厅和南区的2个展厅,文学大咖的互动就此展开。

“四驱马车”藏品、挑山工雕塑,都让莫言驻足观赏。台阶下摆放的钢琴是钢琴家刘诗昆在冯骥才新婚之际赠送的礼物,上面已经签满了名人学者的名字,莫言也欣然提笔,钢琴上又留下了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大名。



在博物馆,莫言看到了冯骥才在搁下写小说的笔,投身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事业的近30年里走过的历程;在“海外名人手迹”展厅,看到了冯骥才收藏的雨果信札、托尔斯泰签名等藏品,冯骥才娓娓道来,莫言看得兴致盎然,还在马尔克斯的签名书前羡慕地驻足良久。

在莫言为博物馆南区的临展厅题字“大爱厅”的牌匾下,冯骥才和莫言一行以及全体师生合影留念。

在场外等待一睹莫言真容的同学们,都举着手机一脸期待;而参与了交流与合影的学子则心满意足,忍不住拿出手机“凡尔赛”。“我把和冯骥才、莫言先生的大合影发给我妈了,我说,这是我人生中见过的地表最强的两个男人!”面对同学的“炫耀”,天津大学北洋诗词社的莫雁翎告诉记者:“今天大家都收获了很多惊喜和干货,莫言先生对于写作的分享十分受用,今天看到两位文学巨匠的聚首,我们作为天大人都很自豪。”

谈写作 说民俗 讲往事

“莫言老师,写小说要不要写大纲?”“您对民间文化是如何理解的?”在天津大学冯骥才博物馆图书馆,等候多时的师生迎来了莫言和冯骥才与大家交流会。机会难得,师生纷纷将热情的问题抛给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

莫言笑容可掬,毫无架子地与大家围坐,从小说创作的心得讲到民间文化的传承,再到与冯骥才跨越数十载的文学情谊,既有“梗”又有“料”。

谈写作之道 让角色做主

“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提。”面对学生提出的关于写作的问题,莫言结合自己的经验一一作答。他认为,如果是短篇小说就无需复杂的大纲,一个故事、一个人物或是一个微小细节,便能撑起整篇创作的骨架;长篇小说则得有纲领性指引,有人会细细打磨出数万字的详细大

纲,把章节脉络拆解得明明白白。“我的习惯比较粗放,想好大概故事就动笔。”

在莫言的小说里,人物可以自己做主。他笑着解析,创作就像一场充满未知的旅程,写着写着,人物和情节就会自己“长”出细节、丰富起来,到最后成品往往和最初的构思大相径庭。那些随心所欲的灵感迸发,尤其是人物命运的自主走向,更是创作里最有意思的常态——“有的角色,我本计划二三十岁就离场,结果在笔下硬生生生活到了耄耋之年;还有的,写着写着就感觉他们自己不想活了,自然而然就落幕了。”说罢,现场响起大家的笑声。

莫言补充道,这种角色“自己做主”的情况,很多作家都有过类似体验。而这一切的前提,都离不开扎实的生活积累,把真实的生活模本和大胆的虚构想象捏合在一起,文字才能真正拥有生命力。

生命与文学里的民间印记

在冯骥才的介绍下,莫言在博物馆惊喜地发现了家乡高密的年画,这很自然地让他谈到家乡的民间文化。在交流中,他和学生们分享了“高密四宝”——茂腔、剪纸、扑灰年画与泥塑,“这些今日的非遗,都是小时候父母买给我的玩具”。

“现实中的老虎是很可怕的,但家乡泥老虎的造型是那么夸张、朴拙、可爱,两头一按进去还会嘎嘎叫,还有一种可以摇的小猴子,一拉也能响;剪纸是很浓烈的红,在油灯的映衬下就更喜庆、更好看了……”莫言说,这些源于童年生活的民间物件,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。比如《红高粱》里奶奶的剪纸技艺、小说中大量浓烈的色彩描写,都源于童年时民间艺术的熏陶,这份影响直到后来被评论家点出,自己才恍然大悟,这些都是来自生命深处的熏陶和影响。

因此,莫言也格外认同冯骥才致力于抢救民间文化的举措:“这些都是老百姓创造的宝贵财富,带着祖先劳动的烙印,是人类精神与文化的记录,绝不能让它们流失。”

这次没看够 下次再来

虽然只是在博物馆走马观花,但莫言由



衷赞叹:“这里藏品涵盖古今中外,从民间到殿堂,没看够!”他笑言,将来有机会要以普通观众的身份悄悄“潜入”博物馆,“看上一天,应该能收获更多感悟”。对于这座“宝藏博物馆”,莫言表示:“天津大学有这样一座博物馆,是师生们的福气。在这里走走转转,能受到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。”他感慨,作家、艺术家的创作与收藏能有这样一座场馆安放,便是最好的归宿。

现场,冯骥才分享和回顾了他与莫言相识40年的故事。1985年,时任《中国作家》编委的他,被编辑力荐的一篇钢笔手稿——《透明的红萝卜》深深吸引,冯骥才说:“我依旧记得那一沓32开的稿纸,读了一晚上,被他文字中独特的想象力、感知力征服了。从那时起,我就成了莫言的‘粉丝’。”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两位文学巨匠已从初识的文字知己到如今互相惦念的老友。“我很希望莫言能来,这20年,我的文学作品相对少了,于是想让好朋友们知道,看见我这些年都做了什么,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!”

记者 王轶斐

图片由天津大学冯研院提供



2025年岁末,寒意渐浓,一场特别的聚会温暖举行。台上一众平均年龄71岁的老人,统一穿着白色正装制服,昂首挺胸齐刷刷向台下来宾敬礼——这是天津市“红烛”禁毒志愿者宣传队成立十周年的现场。

“十年的坚守无法用时间衡量,十年的奉献无法用得失计算……”活动主持人于建文身材娇小、声音清亮”。她曾是天津第一代专职缉毒警察,退休后,带领志同道合的老伙伴们走上了另一片“不退役”的战场。

从“缉毒一线”到“心灵防线”

“我之前做刑警时,侦办过许多涉毒案件,积累了一些经验。”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新一轮毒品渗透进天津。1991年,市公安局刑侦处成立第一支专职缉毒队伍,于建文被任命为组长。近二十年缉毒禁毒一线经历,她带队抓获吸贩毒人员两千余名,三下云南与嫌疑人交锋,无数次在天津的夜色中蹲守、破门、抓捕。

退休后的一天,于建文翻出一张照片——那是她曾抓获的一对吸毒夫妻的女儿,躲在墙角,眼神里满是恐惧与哀求。“那个眼神,我永远忘不了。”她轻声说道。更多画面接踵而至:戒毒所里年轻却空洞的面容,母亲们冰凉颤抖的手,“于姐,救救我孩子”的哀求声此起彼伏。这些记忆没有随着退休而褪色,反而在宁静的晚年生活中愈发清晰。

2009年3月,在相关部门支持下,于建文在新华中学举办了首场“毒品预防教育巡回演讲”。站在讲台上那一刻,她感到一种熟悉的使命感——虽然手中不再有枪,但话语同样可以成为武器。“过去是提枪铐铐和战友抓毒贩,现在选择走进学校社区。”她这样定义自己的转型,“毒品预防要从娃娃抓起,做在前面。”从此,她开着私家车穿梭于天津的学校之间。有时一天要赶两三场

她是天津第一代专职缉毒警 为防毒禁毒退而不休 禁毒防线战场“燃不尽”的光



于建文曾是天津市第一代专职缉毒警察

讲座,午饭常常在车上匆匆解决。但她从未感到疲倦,“每多一个孩子了解毒品的危害,就可能少一段人伦悲剧出现。”

“红烛”燃起:当黄昏成为另一种黎明

2015年的一次同学聚会,成为于建文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。看着相识半个世纪的老朋友——他们大多已退休,有教师、工人、会计,曾是学校的文艺骨干——一个念头突然清晰:“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做禁毒志愿者?”问题抛出的瞬间,她自己都有些忐忑。但回应出乎意料地一致,26个声音汇聚成同一个答案:“我愿意!”

队伍成立之初,“红烛”这个名字在多次讨论后脱颖而出。“红,象征美好生活和阳光向上。”于建文解释,“烛,恰如我们这批人——燃烧自己,照亮他人。”当时队员们平均年龄60岁,如今已到古稀之年。“夕阳也能照红一片土地,映红一片天。”说这话时,于建文眼中闪过一道光。

建队过程充满挑战。于建文自筹5万元,为每位队员量身定制演出服。她联系排

练场地,制定训练计划。队员杜丽萍回忆:“于队长特别严,也特别有耐心,我们得从摆正五个手指学敬礼开始。”

烛光所及:那些被照亮的角落与心灵

十年间,“红烛”的演出地图不断扩展,从城市的社区活动室到乡村小学的操场,从企业会议室到戒毒所的高墙之内,这支老年队伍带着自编自演的节目,走过了三百多场演出,观众累计超过十万人次。

在天津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一场演出,成为许多队员记忆中最难忘的时刻。当《母亲、毒品、孩子》的诗朗诵响起,台上年逾七旬的“母亲”望着台下年轻的学员们,泪水无声滑落。那一刻,演员与观众的身份界限模糊了,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更本质的连接——一位长者对迷途孩子的疼

惜,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呼唤。“我告诉朗诵的队员,你就当台下坐的是你的女儿。”于建文回忆道。台下两百多名学员失声痛哭,演出数次中断。结束后,一位年轻学员拉住队员的手:“阿姨,我想妈妈了,我想回家。”这样的时刻让所有辛苦都值得。

社区演出同样充满回响。在靖江路社区和宝里里社区的演出中,当小品《心声》演到高潮处,观众们自发站起来高呼:“坚决禁毒!”于建文被这一幕深深触动:“那种共鸣,比任何掌声都更有力量。”

中学生,则用情景剧展示毒品的伪装,教他们识别新型毒品的“糖衣”。“我们有个节目叫《毒品家族》,队员扮演海洛因、冰毒、“红烛”照亮社会的背后,离不开家庭支持。姜有亮的老母在他练习台词时,总是默默为他备上一盆热水,让蒸腾的水汽湿润他



于建文走进校园宣传禁毒

的喉咙。他的小外孙女耳濡目染,“我背相声时她在旁边听,有时我背错了,她会说‘姥爷,错了’。”这份来自家人的理解与陪伴,成为队员们坚持下去的温柔力量。

燃烧的成本:选择与代价

所有奉献都有其成本。退休后,于建文曾有一月薪2万元的工作机会——朋友邀请她到外资企业负责安保。面对诱人报酬,她最终婉拒了:“一旦入职,宣讲就要泡汤。与毒贩争夺万千孩子,比保卫一个企业的意义大得多。半辈子干禁毒没拿过钱,退休了也不能让钱迷了心窍。”

母亲去世前一天,作为独生女的于建文没有守在病床前,而是站在学校的讲台上。这个选择至今让她心痛,但母亲的理解成为她前行的力量。老人临终前的嘱托简单而深沉:“一定把禁毒宣传的事做下去,一定让更多孩子远离毒品。”这句话,于建文铭记于心。

光的本质:当奉献成为生活方式

十年过去了,“红烛”获得了“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”荣誉,于建文被评为“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”。

这些个人叙事汇聚成一个更大的主题:当社会习惯将退休与“享受生活”简单画等号时,这群老人展示了另一种可能——奉献不是青春的专利,也可以是暮年的选择;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获取,更在于给予。

于建文偶尔会想象另一种退休生活:每天去公园散步,给家人做可口的饭菜,陪伴孙辈慢慢长大。但她知道,那些记忆中的眼睛——吸毒夫妻女儿的眼睛、戒毒所里年轻学员的眼睛、学校讲台下孩子们清澈的眼睛——不会允许她真正“退休”。“可能对禁毒的情怀太深了。”她试图解释这份近乎执着的坚持。

赵磊

(据天津海河传媒生活广播《百姓故事》)